

彼岸花开在此岸

眼眉越过早晨的栅栏,被露水淋湿的秋便被一团火点燃,园子的角落,被遗忘的彼岸花,轻舒广袖,遗世而独立地轻轻摇曳着。果真,花开不见叶!

托举一支,试着读懂它的花语。叶散花开,花凋叶生,花叶不相见,彼此却有着无穷无尽的爱恋。花梢分成细丝卷曲着欲言又止。我,唯有抱紧心中的寂静。

阳光在大树的枝丫间分出七彩线条,荡漾在美丽的花朵上,彼岸花紧拥着内心的眷恋,也许只为一句承诺,只为一个约定,在僻静幽深之地,敲响时光的木鱼,摇曳自己的一份纯洁和深情。

同行的红裙美女深深陶醉,在忘我地自拍,人与花,已融为一体。是谁种下这一大片火红的生命,而又转身离开,给人震慑的美和无尽的思绪?

恰好今天披了一件绿色披肩,我愿意在花丛中打坐成一片绿叶。招呼同伴,给我也拍一张。就让我做一回它的叶子,传递彼此千年的思念。在一片炫目的红里,我深情地凝眸最亮的一朵,它在我的眸光里摇曳着万种风情。

这一刻,我感觉不到它淡淡的忧

伤,它必定也是满心欢喜的!一定是我前世的爱人。

回味

坠地无痕,一朵朵细碎的心事,托不起渐凉的蝉声。满枝繁香时,秋光正盛,精壮的光阴盛满漫天的星星,鼎盛年华,就是最傲娇的资本。风中的诱惑,不为金银而染,只为香气袭人。

在明月里搜索意象,桂花树下的人儿,采一身晶莹的薄露,你的一个回眸,便醉了整个秋天的梦。一个绵长的呼吸,触碰你温润的指尖,恰如树下那如约的佳人,细密的心思,被风儿吹乱。

有多少次路过,就有多少次沉醉。停留,徜徉,徘徊,甚至琉璃独行……时光终于熬不住,一切该来的来,该走的终究还是走了!

满地凋零的小金子,伏着别人的行色匆匆,暗香残留。未尽的心事,在风雨中呢喃。在秋光旖旎的梦里,我的心事已趋金黄,而你的花瓣已悄然零落,我绽开掌心,只握住你灵魂的一缕清香。

足够我久久回味的了!

乌桕树滋养着乡愁的根须

天空高过炊烟,高过乌桕树,高

过树上的鸟巢,高过黑压压的乌鸦,鸦阵信口开河的鸣叫撕开冬日的裂口。风,总是有意无意地卷起红绿相衬漂亮的心形叶子,该是谁儿时遗忘的花布衫吧!

寂寞的田埂上,一瞥千沟,再一瞥万壑,什么时候乌桕变得如此火红,一眼万年的意念瞬间滋生。忽然想起姐姐的红褂子,抑或哥哥脖子上的红领巾,飞舞在这山谷,一树高过一树,延伸到离村口最近的扭着脖子回头张望的那一棵。

老树日渐消瘦,风来过,雨来过,当年白云漂洗过眼眸,总有一些自命不凡的叶子纷纷逃离,能留下来的,唯有紧紧抱住树身,在老去的时光里,熬红了双眼。一沓心事,在黄昏的抚摸里,碎了一地。

时近隆冬,所有的叶子,在最后一抹留恋的红里,终要离开。乌鸦,无论多嘴还是扯舌,终究还是不离不弃的近邻,时不时地打破天空的冷寂。

乌桕树,绿过少时的梦,红过远方的灯火,最后以满枝的白、白过母亲的白发,比山野小河更静默,极度张开弯曲的臂膀,伫立着,守望着。

一团背影,被北风吹冷。是谁,顶着薄霜的回眸,滋养着乡愁的根须!

谢旭晴

茅屋琐记

平桥区 朱跃杰

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”。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一句诗,简易的茅屋,已不能遮风挡雨,是唐代平民的真实写照。

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农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,但土坯房,茅草顶,依然是主流。社员住的茅屋,用厚厚的茅草做屋顶,墙体是用土坯垒起来的,也有的是土板墙,即用两块木板夹住,里面填土,然后夯实。稍微富裕的用红瓦接个缘,称为瓦接缘,在当时比较常见,全用红瓦屋顶的是凤毛麟角。

我初下乡时,住在房东老董家,其父陈汝绿当年四十多岁,是家里的顶梁柱,陈家是典型的豫南农居,由于孩子多,有三间正屋,三间偏屋,一个大门路,门路里有间厨房,都是土坯房,茅草顶。主妇陈大妈能干,勤劳治家,虽是土坯房,泥巴地,却收拾的一尘不染,给人以干净利落的印象。

我和老董住在屋的西头,老董

比我大四、五岁,当年正谈恋爱,对象是磨镰沟的人,姓季,我们都喊她老季。当时农村谈恋爱,女方往往提出有“三转一响”的条件,“三转”就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,这些都是能转动的,“一响”就是收音机。这些现在都不是事,当年却都是大件,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的价格都在一百二十元左右,相当于半年的收入,关键是车子、缝纫机、手表都难买,买车需要车票,买缝纫机也需要票,即便有钱,也不一定买到。最流行的自行车牌子是上海的“永久牌”和“飞鸽牌”;缝纫机是上海“蜜蜂牌”,手表则是“上海牌”,这些牌子都是当年最时髦的,也是年轻人最羡慕的。

老董的恋人是否提出条件,我不得而知,单凭老董的家庭是拿不出“三转一响”,但热恋的情侣或许不在乎物质。老董恋爱后,睡觉前喜欢神侃,老董虽是初中文化,但喜欢看点古书,那时古书是禁止看的;老董不知哪弄来《薛仁贵征

东》,《薛平山征西》等,看得津津有味。

一九七六年的春天,生产队给我们分三间茅草房,是生产队的牛棚,在稻场旁边,紧邻通往大队的公路。位置坐东朝西,其中一间还养了两头牛,中间是我们的厨房,生产队派人帮忙搭两个土锅台,我和另一知青分别从各自的房东家,搬到这里居住,我们的家当很简单,就是两张床和一个桌子。

茅草房非常简陋,窗户是老式木格子的,没有安装玻璃,夏天蚊虫侵入,蚊蝇虫蚁满屋飞;冬天北风刮过,寒凉难以入眠。我们就找一张白色塑料皮权当玻璃。在这艰苦条件下,没有一点怨言,我曾在这茅屋里,点着煤油灯,读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等书籍,为大队写了许多广播稿,在信阳县广播站播出。到年底,生产队的母牛添两个小牛仔,队里的牛棚不够用,我们又一次搬家,安排在光棍张家宝家。

张家宝上无父母,下无兄弟姐妹,四十多岁尚未结婚。他家里三间茅草房,还有两间偏屋,也是茅草房。其他社员都盖有院落,不知

何故,张家宝并未盖院落,或许是懒得缘故,也或许是一个人居住不需要。

张也长得一表人才,不知为何始终找不到老婆,是生产队里唯一的“寡鳏条子”(当地对光棍的称呼),其实,上世纪七十年代,穷并不是打光棍的缘故,大概是懒的原因吧。我们住在张家,还是自己开伙,其厨房有两个灶台,我们用其中一个,各做各的饭。张为人热情豪爽,有时他做好饭了,就喊我们去吃;我们没菜吃了,就让我们去他的自留地拔菜。

一九七六年的秋季,一场瓢泼大雨,把张家宝土坯房的山墙冲垮,没办法住人了,我们就离开了张家宝家,生产队又安排我们俩,各自回到原来的房东家住,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,我参军入伍离开陈楼生产队。

茅草房,在快速发展的新农村建设中,现在是早已消失的建筑,但在我的心里是温馨的,永远留在记忆里。

信阳市文学 院 协 办